第一章 东方社会发展的象征：东亚的崛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东亚地区迅速崛起，经济相继腾飞，社会不断进步，创造了现代化的新模式，人们称之为东亚模式。这种东亚模式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达到了其发展的顶峰，人们颇多称许。而在 1997 年出现了亚洲金融风暴以后，人们于震惊之余，开始对东亚模式进行反思。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和评价东亚模式，成为一个在理论上与实践上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里，我们谨向读者献上自己的一份思考。

现代化与东亚模式

一 现代化的模式类型

近几十年来，现代化模式一直是现代化研究的热点。国内外学者们根据不同的标准概括出的现代化模式、模型有数十种之多，但总的来说，有三种类型：一种是按生产关系性质来划分的制度模式，如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苏式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等；二是根据各国发展特征、战略类型概括出的理论模式，如现代化模式、内源发展模式、整体发展模式等；三是根据各国现代化起步的时间和原因而形成的实践模式，如“早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发内生型”、“后发外生型”、“后发内生型”等等。

“模式”一词，系英文 model 的译音，是一个多层次含义的术语。“模式”、“体制”、“制度”三者往往容易混用。

“制度”是指由众多相互关联的角色统一形成的角色复合体，是规定个人行为的一种规范，即社会内部的个人在进行某种行为时，要按照被公认的角色期待规则所形成的具体行为方式，被作为社会的规范秩序得到确立，并成为制度体系。如家庭是遵循家庭规则的制度体，国家是基于统治正统性的制度体 。

“体制”一词因它的修饰限定词而表示出不同的含义，如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等。。它在日常生活中和社会科学中都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用法。但不管怎样，体制这个词，本身就或多或少地意味着某种体系或体系的完成。

而“模式”特指某一类型的制度或体系，其内涵要小于制度和体制。

发展模式是基于不同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组合而成。早期的发展模式是英、法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它的特征是议会制和自由市场经济，而德、日这些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的特点则具有强烈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色彩，政治上实行集权主义，经济上实行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十月革命后，高度集权的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模式开始建立。

20 世纪 30 年代，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大萧条，自由资本主义模式开始受到冲击，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开始形成，苏联在头两个五年计划（1928～1937）期间，经济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12%。二战之后，东欧和亚洲一大批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20 世纪 50 年代，苏联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 9.3%，相当于美国同期增长率的两倍。苏联的发展模式被第三世界国家广泛采用，社会主义成为一股潮流，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发

展中国家也纷纷照搬苏联模式，甚至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也开始实行国有化和计划调节。第三世界各国的发展模式是一种混合型发展模式，主要根据自由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这三种模式再加上本国情况而形成，如印度把议会民主同混合经济结合起来，巴西选择了政治独裁和“先增长，后分配”的战略，坦桑尼亚等非洲国家试图把社会主义的一些原则移植到非洲的传统社会中来，亚洲四小龙则在保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大力发展经济。为了探讨东亚发展模式，有必要对现代化模式作纵向与横向的比较、理论与实践的分析。

（一）现代化发展的理论模式

所谓现代化的理论模式，主要从理论的发展过程来考察。

传统—现代型模式这一模式的理论代表人物有 T. 帕森斯、W. 罗斯托、D. 贝尔、A. 英格尔斯等人①，他们接受从斯宾塞到韦伯以来的社会发展进化理论②，按历史阶段将社会发展划分为两种模式，即传统与现代社会。特点之一，是坚持西方中心论，继承经典社会学的“前近代—近代”范型，将人类社会现代化历程划分为“传统—现代”两个阶段，认为现代化就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进化，用西方社会的特质去概括现代社会的特质，从不发达国家的社会特质去寻找传统社会的特质。特点之二，是认为社会发展是单线的，即任何社会在其现代化的过程中都要经过同一发展过程，在现代化这一道路

① T. 帕森斯：美国社会学家
W. 罗斯托：美国经济学家
D. 贝尔：美国经济学家
A. 英格尔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

② 斯宾塞：英国社会学家
韦伯：德国社会学家

上，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只有起跑时间的不同，其起跑线、跑道和终点都是一样的。认为第三世界不发达的原因在于这些国家本身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不利于现代化发展。西方社会的制度、结构和文化是惟一能够产生现代化的模式。他们在“传统—现代”两分式基础上设计了一系列现代化“模式变项”，诸如原始的谋生型经济与技术密集的工业型经济、臣属型政治文化与参与型政治文化、先天决定的封闭型身份制度与开发型的身份制度、大家族与小家族、宗教型意识形态与世俗型意识形态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但对于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是否适用则值得考虑。

中心—边陲型模式　这一理论模式是与以西方中心论为特征的现代化模式相对立的，20 世纪 60 年代后，一些拉美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在谋求发展中总是陷入西方发达国家的统治剥削之中，形成宗主国与卫星国的关系。不发达国家的贫困在于对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关系有着多重依附，要实现真正的发展，必须打破发达国家对世界市场、资源等的垄断，使卫星国对宗主国的依附关系“脱钩”。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普雷维什和弗兰克一致认为①，发达与不发达的两极分化的主要根源在于边陲国家对中心国家的依附及中心国家对边陲国家的控制。主张对现有社会的社会秩序和国际秩序进行变革，认为人类和谐发展的障碍在政治与社会方面，而不在物质与经济方面。这一模式还专门讨论了不发达国家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整体发展型模式　这一理论的特点在于用体系的观点来审视整体世界及其各个部分的发展变化，认为整个世界形成了一

①普雷维什：阿根廷社会学家
弗兰克：德国依附理论代表

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各个国家和社会只是体系内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组成世界体系的一个单元或次体系。世界体系的结构是由中心国家、边陲国家和半边陲国家三个部分组成的。中心国家是在世界体系中占主导地位并可以控制其他国家的国家，边陲国家是受中心国家控制的国家，半边陲国家则居于两者之间，既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控制边陲国家又在某种程度上受控于边陲国家。一个国家或社会在世界体系中地位的升降以及何时、如何升降并不是由其本身的努力所能左右，而是由结构状况及世界体系本身的运动规律所决定。

以上三种现代化的理论模式分别反映了19世纪以来以西方为主体的现代化发展趋势。

然而，近几十年来，东亚作为世界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颇具代表性的地区，其发展趋势不论用上述哪种理论模式分析，都很难对这一地区的现代化作出有力度的解释。东亚现代化理论的进程远远落后于该地区现代化的实践进程。东亚缺少西方社会那种经济和政治上的一体性，也不像拉美国家那样清一色的殖民体系和与之相适应的发展水平。东亚地区既有发展中国家，又有新兴工业化国家，更有发达的现代化社会和社会主义国家。仅就中国自身发展状况来看，东部、西部、中部的发展就很不均衡，而且这几个部分足以构成一个巨大的发展整体。在东亚惟一能构成共同基础的就是儒家文化传统。以儒家文化传统为中心，在经济和社会结构方面接近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这一角度来思考东亚发展的理论模式，不失为一种良好的启示。

（二）现代化发展的实践模式

按照目前发展理论研究的状况来看，现代化发展的实践模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式可从生产关系性质上和现代化启动的原因与时间序列两个方面加以分析。

实践模式的第一种区分方式是按照生产关系性质加以考察。从生产关系的性质来划分，可分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混合型现代化，每一种类型都有多种变项模式。我国学者罗荣渠认为，其中最具有决定作用的三组变项模式是：①所有制性质，包括关于社会财富与生产资料的占有和分配方式。这是决定社会性质的重要变项。②经济的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这是包括社会财富交换方式的变项。③国家权力结构。这是组织现代化协调运作必不可少的政治制度的变项。

先看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按照罗荣渠的观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发展格局是：资本主义私有制 + 自由市场 + 分权型或集权型现代国家机构

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的变化，这种资本主义现代化在百多年的时间里不断变易，演化出多种模式，走着不同的“现代化”的道路。如英国模式、美国模式、德国模式、日本模式等等。但是按照资本主义理想模式来看，构成西方现代化进程的“统一性”的三个重要因素是科层化、工业化和民主化。这三大因素在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表现，因此，这些不同表现的“组合体”就造成了西方各国现代化进程的多种形式。

在英国，国家科层机构比较晚地加入其制度结构中，即开始于 19 世纪下半叶，“民主化”的实现，最先是由于商业资本主义的扩展，然后是由于工业化。在资本主义“统一性”模式的三大要素（科层化、民主化和工业化）中，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在英国是居于支配和统治地位的因素，它影响并调节了其余两个因素。在英国，由于专制政权建立官僚主义国家机器的势力已告失败，因而既不存在最上层官僚等级结构中的中央集

权，也不存在具有欧洲大陆那种重大力量的政治现象。英国是在文官制度改革之后，才引进科层制。

欧洲大陆各国的发展与英国不同，它们的发展都是与科层式专制主义和专制主义官僚制度一起开始的。法国大革命之后，拿破仑通过政治和司法改革，成功地将革命的成就与传统和科层制调和起来，创立了现代官僚政府国家。在法国，工业化出现较晚，对于政治和社会制度及其相互作用的构成没有很大的促进，因此，科层制在法国现代化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德国，由于资产阶级较为弱小，没有形成一场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但科层制的作用在德国并没有减弱，科层化是德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主导因素。德国各界政府是由官僚组成，并且改革也是由官僚设计的，官僚在为工业化准备经济、司法和教育诸方面前提条件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德国的官僚机构，除具有专制主义官僚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高度干预性，以国家为本位注重发展，并明显地偏袒统治寡头，这是法国和英国官僚机构所没有的特点。由于德国相对英、法来说是一个欠发达地区，并且在领土上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因此，官僚机构的首要任务便是在这些分散的领上上建立国家并从事经济、社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从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三个要素可看出，各国现代化特点都是出于对这三种要素的特定组合，也即三要素中不同的“主导要素”的特定组合主导要素组合不同，所表现出的现代化模式特点也不同。在英国，主导要素是工业化，工业化带来了民主化和科层化。在法国，主导要素是科层化与民主化的综合，而工业化出现较晚，影响面也较小。在德国，则是科层化和工业化相结合带来了现代化，而民主化始终缺乏。总之，科层化、民主化和工业化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

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也是其模式类型的典型表现。

再看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社会主义模式中有非洲农业社会主义模式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非洲农业社会主义模式的特点是：在私有制方面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原始村社，在国家权力结构方面则是一党集权制。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的实行土地公共所有制的原始公社，有可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而不必经历西方社会发展的那种瓦解过程。这种情况在非洲一些国家被付诸实践，这就是非洲社会主义。

非洲社会主义的领导者们认为，非洲的传统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原始村社，这种村社中没有阶级和社会冲突，土地公有，人们共同参加集体劳动，产品平均分配。非洲虽然受到西方的影响，但变化不大，广大农村仍然保留着土地的村社集体所有制。非洲国家领导人设想在农村村社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既要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又要避免资本主义那种大工业带来的弊病，保留住传统的村社制的平等主义原则。他们试图走一条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工业化，也不同于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是优先发展农业，通过农业现代化带动整个经济现代化的道路。这种社会主义模式并不是建立在大工业和工业无产阶级的发展基础上的，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是脱离现实的。它的特点是高投入、低效率，高福利、低增长。由于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这种发展模式正面临着全面危机。

苏联现代化模式的特点是：经济方面，实行纯粹的公有制，包括全民和集体两种公有制形式；经济结构实行产品经济，排斥商品和货币关系，试图超越充分发展的商品经济阶段；经济运行机制实行单一的计划经济，并把指令性计划当成计划经济的唯一标志；管理体制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统一，

国家直接管理企业。政治方面，国家权力结构表现为中央集权型。总之，经济上高度集中，政治上高度集权，是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这种模式不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自发过渡，而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已经形成，在上层建筑领域中进行革命，用这种革命带动经济革命而形成的。把国民财富和资源的分配集中在国家权力手中，通过国家有计划地发展国营和集体为主导的国民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国。

20 世纪 50 年代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是仿效苏联模式，其共同点都是反资本主义所有制，强化传统机制的力量，推行指令性经济，加强中央集权，把改变阶级结构作为模式创新的关键，用社会理性代替个人理性。这种模式显然在建设初期发挥过巨大优势，但随着实践的发展也出现了危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典型代表有苏联模式、南斯拉夫模式、前匈牙利模式、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模式等等。

最后，看混合型现代化模式。这一模式的特点是在所有制方面为几种生产方式的结合，兼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经济混合；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采取自由市场；在国家权力结构方面采取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机构。

这种模式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尚未定型的一种现代化模型。从传统体制来看，具有社会主义特征；从市场体制来看，又具有明显的面向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外向型特征。这种模式在经济上受西方强大势力的吸引，具有依附性，政治上又带有明显的西方主义色彩，因此，显示出混合型现代化模式特点。混合型现代化模式有印度模式、巴西模式、埃及模式、墨西哥模式、东亚模式等。

混合型现代化模式以印度模式最为典型。所谓印度模式是指尼赫鲁与英迪拉·甘地时期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特点是把

计划经济与议会民主结合起来。国家掌握基础工业，保留小私有企业和农村村社组织。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承担起发展基础设施的重任。而私人企业则集中在家用电器、石化、机动车、通信等以进口零件和半成品为基础的部门。政府对经济负有全面的责任，并直接经营钢铁、飞机、铁路、原子能、军工等公共事业和基础工业。国家垄断了基本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工业，其余一些制造加工消费品的部门则由私人企业去开发。政府对一些重要私营部门也有权加以接管并实行计划和管制。

实践模式的第二种区分方式是按照现代化启动的原因和时间序列加以考察。各国在现代化的实践过程中，起步时间和发展动因是不一致的有些国家已经具备了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等现代型社会特征，有些国家是外部社会要素传入和刺激的结果。近年来学术界有人根据现代化的启动时间和原因将社会发展模式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早发内生型”。这一类型是指现代化起步较早并靠自身内部社会经济要素发育而成的欧美发达国家，以英国为典型。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改变了自身社会的政治结构，进行了一系列的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为推行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开辟了道路。根据这些前提条件，蒸汽机等先进技术推动了工业革命，进而改变了英国经济结构，由此使英国最终实现了超越时代的过渡。英国的情况表明，一个社会系统具有两方面的功能：维持和创新。其创新功能的发挥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必须依赖于社会内部结构的矛盾运动。

第二类是“后发外生型”。这一类型指现代化起步晚，主要由外来文明因素的渗透而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如中国、日本、俄国就属于这一类型。这种类型的国家往往采取自上而下

的推进过程，通常以改革的方式来面对国家外部的文化制度、观念、规则的巨大冲突。在外来暴力的入侵与高水平的经济技术面前，这些国家又形成强烈对抗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情感。它们主要靠国家政府的强力来推动经济发展。

日本是较典型的“后发外生型”的国家。日本在1639年颁布锁国令之后，与世界各国来往甚少，民众过着与世隔绝的岛国太平生活，内部一直没有产生工业革命、市民革命、技术革命等现代化的动力因素，正是在强大的外部压力之下，日本被迫打开门户，出现了倒幕思潮和反封建运动，并经过明治维新，使日本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日本的工业化过程是西方文明的输入和对西方文明的适应、消化、创新两方面相互结合的过程。从本质上看，作为启动器的外国又是通过日本社会结构的内部矛盾这个内因发挥作用的。

第三类是“后发内生型”，这种类型的国家现代化发展较迟，是未受外部因素影响而自发走向现代化道路的。

前两种模式在现代化实践过程中是主要类型，说明在现代化的起因上，早发展国家主要依靠内部要素发育成熟，迟发展国家主要依靠外部文明的刺激、吸引而形成。在社会发展模式上，早发内生型国家是以产业革命、科技创新和民主化为先导，而后发外生型国家往往面临文化变革的艰难突破。同时，迟发展国家在人口、区域、政治等各方面发展不平衡，往往加大发展难度。但另一方面，基于种种“后发优势”，特别是在科技发展中，可以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实现超前发展，减少创新中的物质投入，可产生一系列的“后发效应”。

二　东亚模式与特点

东亚模式是指战后日本和新加坡、韩国与中国的台湾、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港地区以及马来西亚和泰国等的发展模式。这些国家的发展战略有许多共同的特点，并且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日本在二战之后上升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目前国内生产总值已赶上美国。亚洲“四小龙”随日本之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而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经济也迅速发展，平均经济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四小龙。

东亚的崛起，已成为二战后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最大奇迹。世界银行在 1993 年出版的《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的调研报告中指出，在 1960 年到 1985 年之间，日本和“四小龙”的实际人均收入增加了四倍多，东南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增加了一倍多。“如果高速增长的分布是随机的，那么，如此集中的区域性增长是极为罕见的，大约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统计，东亚地区在过去的 20 多年间平均增长率高达 8% ，远远超过世界发展中国家的 4.3%和工业发达国家的 3%的增长水平。东亚在全世界的 GDP 中所占比例从 1960 年的 4%猛增到 1990 年的 25 。与此同时，外贸规模也迅速扩大。1965 年，东亚地区的出口额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为 10%，1993 年已占到 25.8%。至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西方经济处于低谷，而东亚经济则蓬勃发展。在 1993～1995年，东亚连续三年 GDP 增长率超过 9%，而且所有国家和地区都超过 1986～1995 年的经济增长幅度。

日本是目前东亚地区最发达的国家，但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仅仅相当于当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在 20 世纪 50 至 70 年代之间日本的经济飞速发展。战后日本始终把发展经济“赶超欧美”放在首位。政治上，不效仿英美两党轮流执政的做法，而是自民党掌握政权。经济上，不完全照搬欧美的“产业民主主义”，而同时吸收社会主义国家经验，集中财力，加强重点建设。军事上，将军费增长控制在较小范围内，以便

进行扩大再生产。同时注重发挥市场调节机制，日本模式的特点之一，就是市场机制与经济计划相结合，既承认市场机制是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较好方式，同时又利用经济计划来弥补市场经济的某些缺陷，从宏观上指导协调全国经济的发展。日本对现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三种计划即预测型、政策型和调整型兼收并蓄，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日本式“计划经济”：①为广大私人企业提供权威性经济预测；②为促进各项经济政策的相互协调，给国有垄断企业和部门提供可行的指导计划；③调整各集团之间的关系并促进社会结构的合理化。日本上述经济计划特征，使日本政府获得了比欧美国家强得多的调控能力。日本既强调“竞争法则”，迫使企业接收受市场考验，又注重防止“商战”过激，维持市场秩序；同时注重政府干预与财金调节作用，保证宏观调控消费，加强重点投资，扩大积累；以产业政策为中心，为发展中长期战略产业作超前准备；以“企业系列”为核心，形成长期、稳定、配套的企业间协作网络。上述日本高效率的经济运作机制，为日本经济发展带来了最佳效果。20 世纪 50、60 年代是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 50 年代，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 9.1%， 60 年代为 11.3%， 60 年代最后 3 年为 13%。这一发展速度大约比联邦德国、法国快一倍，比英国、美国快两倍。高速、持续发展的结果，使日本的经济地位迅速上升。 1950 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英国的 39 、法国的 38%、美国的 4%，其经济实力在 5 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最弱的。 1955 年开始“起飞”， 1967 年超过英、法两国，1969 年又赶上联邦德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日本进入 90 年代之后，出现了衰退和萧条，国民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但在 1995 年第四季度开始回升， 1996 年进一步好转，经济增长率达到 3.9%。进入 1997 年后，日本经济发展逐渐缓慢。

韩国在 1960 年人均国民收入仅为 83 美元，比当时的印度还低，失业人数近 200 万，占总劳动力的 20%。1961 年，朴正熙等人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夺取了政权，并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此后 20 多年处于军人专制统治之下，维护了政局稳定。韩国政府任用了一大批技术专家担任政府要职，并率先发展造船工业，打入中东建设市场在韩国，经济计划是政府的一种一体化功能，经济计划部的首脑同时兼国家政府副总理。由于韩国政府的积极干预政策，提供金融优惠，鼓励重化工业的发展，取得了经济上的迅速发展，成为东亚地区的新兴工业化国家。资料显示，韩国 1995 年国民生产总值高达 4500 多亿美元，人均突破 1 万美元大关。

新加坡于 1824 年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在长期的殖民统治下，经济畸形发展，工业非常落后。新加坡在独立之前是典型的单一殖民地经济结构，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只有 8.6%，而转口贸易及与之有关的经济部门却占 80% 以上的比重。1959 年新加坡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在此后 30 多年的时间里，经济上取得了迅猛发展，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的势头。它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从 1959 年的 19.68 亿新元增长到 1994 年的 1050 亿新元（750 亿美元），增长了约 53 倍，人均 GDP 从 1959 年的只有 404.5 美元，增长到 1994 年的 25597 美元，增加了 63 倍。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以转口贸易为基础的畸形结构转变为一个以制造工业为中心，交通运输、商业贸易、金融旅游等全面发展的多元化经济结构。20 世纪 70 年代末率先进入“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行列，现已发展成为东南亚乃至亚太地区的区域中心。

中国台湾地区也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地区之一。据 1993 年的《台湾统计手册》统计，1963～1973 年，台湾工业年均增

长率高达 18.3%，其中制造业的年均增长率达 20.1%，注册的工业企业由 1963 年的 24837 家增至 1973 年的 32318 家，工业产值在 GDP 中的比重由 1960 年的 26.9%提高到 1973年的 43.8%；工业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由 1960 年的 20.52%提高到 1973 年的 33.69%；出口贸易额中工业制品的比重由 1960 年的 32.3% 增至 1973 年的 84.6%。台湾工业形成了一个以出口加工区为依托，以轻纺、家电等加工业为核心的产业支柱，由此带动了经济的起飞。即使在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台湾仍保持相对稳定，经济增长率（GDP）达到 6.72%，不仅在亚洲“四小龙”中名列榜首，而且在亚洲也排名第二。人均 GDP 为 13490 美元，较上年增长 5.61%。消费物价上涨率为 1.1%，均为近几年来最低，失业率维持在 2.6% 的相对低水平上，全年股价加权指数上扬 18%.

香港地区近几十年的发展也很快，尤其是在金融业方面，香港是仅次于伦敦和纽约的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战后，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香港银行金融体系日益开放、透明与健全，经济实力也迅速增强。二战后初期香港的银行有 140 多家。而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初和 70 年代末，银行达到 2000 多家。香港金融市场是伴随着经济发展由单一的银行逐渐成长与发展起来的。战后，随着香港经济结构的转型，制造业及对外贸易得到长足发展，香港金融市场步入迅速发展阶段。特别是 20 世纪 70 年代后，随着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趋势的扩展，香港金融业与国际市场联系日益紧密，非银行存款机构及非存款金融机构发展迅速，香港金融业发展进入黄金时期。20 世纪 80 年代后，香港金融市场进一步趋向成熟，结构日益健全，市场监管逐步完善，香港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从而使其在 1997 年的金融危机中经受住了金融投机者的猛烈冲击，

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得以巩固和发展。

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新形势下，天赋资源的丰富与否、地区条件与位置、国家的大小、资本输入的多少，都将是决定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差别的主要原因。35 年前的东亚经济还只占世界总产值的 4%，到 1990 年已经占到 25 。自从人类创造工业文明以来，亚洲国家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平等的对话、磋商与合作。“东亚模式”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化的一元发展模式，开创了东西方两种现代化模式同时并存的新时代，极大地丰富了世界及发展中国家关于通过改革以实现经济增长的现代化的理念、理想、行为模式和发展道路的选择。一定的发展模式通常与一定的历史文化相联系。“东亚模式”证明，除西方文化渊源之外，世界上还有东方文化的源流。

东亚在短短的几十年中，经济飞速发展，究其原因，学术界观点众多，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

其一，经济发展论认为：

东亚经济发展关键在于选择了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尤其是出口导向或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20 世纪 50 年代末，亚洲“四小龙”等先后实行出口导向战略，把经济活动的重心由国内市场转向国际市场，有效利用了国外资本、市场、原材料和当地的劳动力资源，使出口额迅速扩大，成为带动经济高速发展的引擎。

其二，政府体制论认为：

东亚经济的发展关键在于有强力政府。强力政府是有强烈的经济建设意识和强大的导向作用。“强力政府”实现了有利于发动经济增长和缓解随之产生的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压力的制度创新、制度供给，而且以较高的“政府质量”，有效地确保了各种制度安排的顺利实施，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增长

和工业化进程。

其三，综合现代化论认为：

促成东亚经济发展的要点很多，例如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不断开放和调整的产亚政策，强有力的政府，温和集权主义与市场原则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公营经济与民营经济相互合作以及政府同企业界的密切联系与协调，技术引进及其“内化”，特有的企业文化，较高的国民教育水平和民族文化的复兴等等，都是造成东亚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

其四，儒家文化论认为：

东亚工业化地区成功的基本原因，是因为它们共同的儒家文化背景，儒家传统关于伦理道德和正确人际群体关系的亚洲式价值观念体系是保持东亚工业化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决定意义的天生本性。

上述论点表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界学者，都从自己的视角对东亚经济的发展进行了研究，其论点也都有一定的合理性。

还有的学者从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分析了东亚崛起的原因。

客观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美国在战后对日本的大力援助；美国在亚洲的扩展与两次亚洲战争的军事采购；低成本的海洋运输，大大扩展了像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海洋贸易，接近公海航道诸国因之兴旺起来的地区优势；东亚诸国，特别是韩国、日本，无须自己承担安全保障，有美军的“保护伞”，因而可集中财力发展经济；美日贸易摩擦，对日本采取限制进入，从而给其他东亚国家与地区良好机遇进入国际市场。

主观原因有以下几点：

其一，政府有限的政策干预。

根据不同的经济发展重点，政府有限的政策干预作用，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